

清代侍衛等級新探*

陳章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引言

「**hiya**」，穆麟德轉寫為 hiya，音譯為「蝦」或「轄」，漢譯為「侍衛」。迄今為止，學界針對清代侍衛的研究相當匱乏，僅有數篇專文及一本論著。1977年，陳文石發表〈清代的侍衛〉一文，¹論述「侍衛」是滿洲為使族人在滿漢共治的官僚體制下便於進入統治核心而設，這是學界最早直接以「侍衛」為題論述清代侍衛制的論文。1992年，陳金陵刊出〈簡論清代皇權與侍衛〉一文，²探討侍衛與皇權的關係，不過或受客觀條件所限，論述相當簡略。黃圓晴是當前研究清代侍衛制的主要學者，2010年她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碩士論文便以〈清代侍衛制度初探〉為題，但並未公開。目前黃圓晴有兩篇直接以侍衛為題的文章問世，其一是〈清代滿漢官制——以侍衛的升遷為中心〉，其二是〈試論清代漢侍衛與綠營〉，主要著眼點是清代漢侍衛的銓選與升遷，但對於侍衛制的一些基本面仍缺乏瞭解，³對於侍衛等級更少有涉及。

* 本文承蒙三位匿名審稿人提供寶貴意見，並承《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編輯先生細緻審訂，統此致謝。筆者文責自負。

¹ 陳文石：〈清代的侍衛〉，《食貨月刊》復刊第7卷第6期（1977年9月），頁249-61。

² 陳金陵：〈簡論清代皇權與侍衛〉，載《清史論叢》編委會（編）：《清史論叢1992》（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1-68。

³ 如黃圓晴在〈試論清代漢侍衛與綠營〉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清代的侍衛中，除了三旗侍衛與宗室侍衛之外，還有漢侍衛。奕慶在《侍衛瑣言》中談到漢侍衛是通過武舉選拔的侍衛，但考察清代官書檔案，會發現除通過武舉選拔漢侍衛以外，還包含遣子入朝、督撫薦舉、水師侍衛等多種方式，漢侍衛選拔呈現多元化。」由此可知，黃圓晴其實已將「漢侍衛」與「漢人侍衛」完全混為一談。在清代，「漢侍衛」特指武進士出身而擢為侍衛者，只關出身，無關族屬。黃圓晴上文所言通過「遣子入朝、督撫薦舉」方式成為侍衛者，已非「漢侍衛」範疇。參見黃圓晴：〈試論清代漢侍衛與綠營〉，《歷史檔案》2014年第1期，頁74；再如，黃圓晴認為八旗滿洲、蒙古武舉考試於雍正元年（1723）舉行，雍正十二年（1734）時停止滿洲、蒙古武場考試之例，惟漢軍仍准應試。直到嘉慶十八年（1813）才恢復滿洲、蒙古旗人與漢軍、漢人一體考試之例。參見黃圓晴：〈清代滿漢官制：以侍衛的升遷為中心〉，載趙志強（主編）：《滿學論叢》第1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1年），頁111-12；黃圓晴：〈試論清代漢侍衛與綠營〉，頁77。然而此觀點只限於制度層面的考察，忽略了現實層面有大量例外，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武狀元為滿洲正黃旗人德灝，授一等侍衛；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武探花為滿洲正黃旗人德明。由此可知，乾隆年間滿人仍可參加武舉考試。參見朱彭壽（撰）、何雙生（點校）：《舊典備徵》（與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四，頁84。

1988年，常江發表〈清代侍衛制度〉一文，⁴從制度、侍衛的來源與待遇、侍衛的作用三方面闡述了侍衛群體的特殊性。在此基礎上，常江與李理合作，將內容加以擴充，完成《清宮侍衛》一書，⁵這是迄今為止在清代侍衛制度方面僅有的專著。2013年，該書再版，改名《清宮大內侍衛》，然而無論是內容還是章節，較原書並無多少改變。儘管如此，該書已是對於清代侍衛最為詳盡的論述，從史料出發，從多角度考察侍衛群體的全貌，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清代政治史的涵蓋面。⁶該書在侍衛等級方面亦有所涉及，但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方面依然有拓展的餘地。

關於清代侍衛系統的構成，歐立德似乎認為只由「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侍衛」三者構成。⁷實際上，侍衛系統的架構要宏大得多。張淑芝雖意識到內廷侍衛系統的存在，但卻認為「御前大臣」、「御前侍衛」、「御前行走」歸皇帝直接管轄，而「乾清門侍衛」、「乾清門行走」及一、二、三等待衛歸御前大臣率領。⁸此說值得商榷。

內田直文將乾隆元年(1736)漢人武進士許成麟視為御前侍衛，⁹然查得許成麟為二甲第二名武進士，只是三等待衛而已，¹⁰與御前侍衛簡直有雲泥之別。其後許成麟也一直在地方擔任武將，與御前侍衛的仕途迥異。事實上，關於侍衛等級的訛誤在二手研究中不勝枚舉，例如張杰在《清代科舉家族》一書中認為岳泚是御前侍衛，¹¹似乎缺乏依據。考索史料可知，岳鍾琪之子岳泚、岳澇僅被授予藍翎侍衛。¹²白雅詩將趙良棟之子趙宏偉視為鑲黃旗三等待衛，可能有誤，因趙氏家族並非旗人。¹³

⁴ 常江：〈清代侍衛制度〉，《社會科學輯刊》1988年第3期，頁85–91。

⁵ 常江、李理：《清宮侍衛》（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年）。

⁶ 然而，該書的缺陷亦顯而易見，如依然未能解答清代侍衛制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諸如侍衛制的來源、侍衛等級的劃分等等。另外，引用材料幾乎全來自官修政書，其他諸如檔案、方志、家譜、族譜、文集等材料極少引用。而在布局方面，全書亦過分傾向於論述滿洲侍衛，對於漢侍衛、蒙古侍衛、回子侍衛等群體所費筆墨無多，細節上亦不夠深入，流於泛泛。

⁷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rt 2. Ranks in the Imperial Bodyguard, Vanguard, and Guard,” p. 366.

⁸ 張淑芝：〈清宮朝珠與滿族東珠〉，《滿族研究》1995年第2期，頁39。

⁹ 內田直文：〈鈕祜祿氏額亦都家族與清初內廷侍衛〉，《成大歷史學報》第36號（2009年6月），頁45。

¹⁰ 《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年），卷三一，頁626。本文徵引《清實錄》均據此本。

¹¹ 張杰：《清代科舉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99。

¹²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五，頁840；清國史館（原編）、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261。

¹³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Jesuit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1722): Imperial Networks and Patronag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4 (2011), p. 123.

此外，楊珍似將「內廷行走」與「御前行走」等同，值得商榷。¹⁴徐彬彬認為乾清門侍衛是清代「『蝦』之最名貴者」，¹⁵顯然有誤。劉仁超誤將《(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所載「酌量衙門大小，職事繁簡，先改鑄內部院，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句讀為「酌量衙門大小，職事繁簡，先改鑄內部、院、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¹⁶似乎不明了「領侍衛內大臣」乃一固定官職；何冠彪則將「領侍衛內大臣」斷句為「領侍衛」和「內大臣」，視為兩種職位。¹⁷可見學界對於侍衛的研究相當匱乏，乃至不知有「領侍衛內大臣」一職。

歐立德認為清代侍衛 (*hiya*) 可分為宮廷侍衛 (Imperial Bodyguard) 和高級侍衛 (Senior Bodyguard)，宮廷侍衛可稱為「領侍衛」，¹⁸高級侍衛則可稱為「侍衛」。¹⁹此種分類法於史無徵，「領侍衛」的稱謂亦不存在，此說或源於對「領侍衛內大臣」在構詞上的誤讀，與何冠彪將該詞斷為「領侍衛」和「內大臣」的錯誤可能如出一轍。

清代在新疆亦駐有侍衛，關於此侍衛群體，目前僅見魯靖康〈清代侍衛新疆史跡考——以《清實錄》為中心〉、耿琦〈清代駐守新疆「侍衛」職任考述〉兩篇專文。魯靖康以「遣新侍衛」在新疆的服役內容為重點考察對象，但對駐守新疆侍衛的職守差異及服役流程闡述過簡。耿琦一文論述較詳，但文中有不少常識性錯誤，如首句指出：「清代，侍衛亦稱之為『轄』或『蝦』，屬武職京官，統歸『領侍衛內大臣處』管轄。」²⁰此說值得商榷。有清一代，並非所有侍衛皆歸領侍衛內大臣處管轄，御前侍衛和乾清門侍衛便歸御前大臣處管轄，與領侍衛內大臣無涉。耿琦在文章第四節「委藍翎侍衛」一開篇亦指出：「按清代侍衛制度，侍衛依照品級僅設有頭等、二等、三等侍衛和藍翎侍衛四等。」²¹此說值得商榷，因為若依品級論，清代尚有從五品的「四等侍衛」(詳下文)。耿琦還將「軍前侍衛」、「軍營侍衛」這樣的泛指性稱謂與「領隊侍衛」、「卡倫侍衛」、「委藍翎侍衛」並列，視為專有名詞，筆者對此不敢苟同。²²

可見，即便是最近的學術成果，對於侍衛等級亦缺乏深入了解，未免淪為皮相之論。顯然，此一課題亟需拓展。本文爬梳史料，對清代侍衛等級問題展開深入論述，希冀有補白之功，從而在此領域上有裨於學界。

¹⁴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272。

¹⁵ 徐彬彬：《晚清民國史事與人物：凌霄漢閣筆記》(臺北：獨立作家，2016年)，頁245。

¹⁶ 劉仁超：〈清代福建臺灣總兵官印信考：附福建臺灣澎湖總兵官印信考〉，《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1期(2014年3月)，頁233。

¹⁷ 何冠彪：〈乾綱獨御、乾綱獨斷——康熙、雍正二帝君權思想的一個側面〉，《漢學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頁282。

¹⁸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81: "The most elite guard unit was the Imperial Bodyguard (*ling-shiwei* or *qinjun ying/hiya*), which followed the emperor everywhere."

¹⁹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366.

²⁰ 耿琦：〈清代駐守新疆「侍衛」職任考述〉，《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頁117。

²¹ 同上注，頁122。

²² 同上注，頁117。

「御前侍衛」與「乾清門侍衛」亦分等

內廷侍衛系統是清代侍衛制的核心，由「御前大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共同組成，三者俱無定員。²³「御前侍衛」與「乾清門侍衛」統稱「內廷侍衛」，在侍衛諸類別中待遇最高。「內廷侍衛」一詞在《清實錄》等官修史料中偶有述及，²⁴但無明確定義。雖《清朝文獻通考》等官書皆曰「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皆于三旗侍衛內簡用」，²⁵實際上亦有大量內廷侍衛並非來自上三旗。不過有清一代，內廷侍衛的主體依然出自上三旗，這一點毋庸置疑。故此，與其說清代侍衛制「首崇滿洲」，²⁶不如說「首崇上三旗」。

三旗侍衛按當差場所分內、外兩班，「宿衛乾清門、內右門、神武門、寧壽門為內班，宿衛太和門為外班」。²⁷內班負責晝坐門禁，夜守扃鑰，有散秩大臣一人，侍衛親軍十人。宿衛中和殿則有侍衛什長三人，侍衛親軍三十人。宿衛太和殿為外班，「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總統之，內大臣、散秩大臣二人隨班入直」。²⁸那為何乾清門、內右門、神武門、寧壽門為內班？因乾清門、神武門分別為內廷的前、後正門，寧壽門與內右門則是最兩側的門，此四門構成一個獨立的空間，一般稱為「內宮」（見圖一）。然則「內宮」與「內廷」區別何在？簡言之，「內宮」是地理空間，「內廷」則是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空間，與「外朝」相對。故此，內廷侍衛名義上是在內廷（史料中亦間或稱「內朝」，後文會有涉及）當差的侍衛，落實到具體地點，則是在「內宮」——「以乾清門、乾清宮為中心，左右配以內宮、宮中衙門的內廷」²⁹——值宿的侍衛。御前侍衛「御殿則在帝左右，從扈則給事起居」，乾清門侍衛「則侍從立於簷霤，扈蹕則弧矢前驅，均出入承明，以示親近」。³⁰故此，內廷侍衛皆皇帝親近之臣。

不過有清一代，宮中侍衛的具體值班地點亦有變化，如光緒十二年（1886），派大門三旗侍衛在寧壽門外罩下直班，內廷侍衛則在寧壽門內東邊南圍房直班。³¹嘉慶二十四年（1819）規定，宮門先由總管太監遵旨開啟，再傳達給值班的奏事處官員，

²³ 崑岡等（總裁）：《（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1991年），卷五四三，頁9。

²⁴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三，頁931；卷五五四，頁11。

²⁵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十通》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卷一百八十，頁6403。

²⁶ 關於「首崇滿洲」學術界有不少論述，以劉小萌的研究結果較為精當。參見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17-23。

²⁷ 《清朝通典》，《十通》本，卷三一，頁2196。

²⁸ 《清朝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頁6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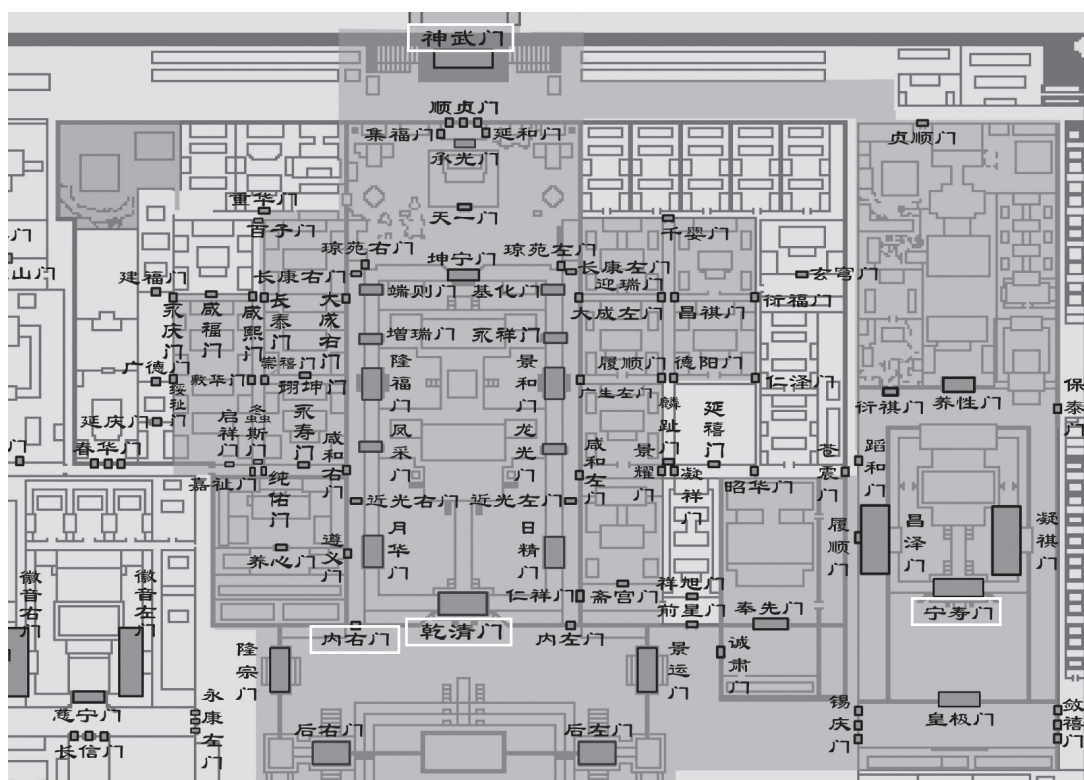
²⁹ 內田直文：〈鈕祜祿氏額亦都家族與清初內廷侍衛〉，頁17。

³⁰ 福格（撰）、汪北平（點校）：《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二版），卷一，頁25。

³¹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七，頁16。

繼而轉達給值班侍衛班領，令該班侍衛官兵執行。而在內廷行走的侍衛，一旦值班，不准擅動，不得擅離職守。非值班的內廷侍衛可出入內廷，輔助其他侍衛一體稽查看護。³²開門之後，在內值班的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需派兩名將人員帶引入內，其餘值班侍衛不得擅動。若皇帝親臨，則所有值班侍衛皆需佩帶刀弓，隨同護駕。³³

圖一：紫禁城內宮示意圖³⁴



「御前大臣」乃內廷侍衛系統首腦，昭槤《嘯亭雜錄》云：「本朝鑒明弊政，不許寺人干預政事，命內務府大臣監之。然內廷事務，每乏統領之人，仁皇習知其弊，特設御前大臣，皆以內廷勳戚諸臣充之。無定員，凡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諸務，皆

³² 宗人府(纂)：《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2冊，頁160。

³³ 同上注，第1冊，頁1754。

³⁴ 故宮博物院繪〈故宮總平面圖〉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Big5/f/totalmap.html。檢索日期：2016年7月3日。

命其統轄。」³⁵換言之，內廷侍衛歸御前大臣統轄，獨立於領侍衛內大臣所轄之侍衛處。侍衛處前身乃領侍衛府，所轄主體為大門侍衛，分一、二、三等待衛及藍翎侍衛。³⁶各等級皆有定員，如「一等待衛三旗六十人，宗室九人。二等待衛三旗一百五十人，宗室十八人。三等待衛三旗二百七十人，宗室六十三人，藍翎侍衛三旗九十人」。³⁷該數額僅限大門侍衛，內廷侍衛則無定員，各等級並不包含在該數額之內。

《清史滿語辭典》指出：「清代侍衛分一、二、三等及藍翎侍衛，還有保護宮禁安全的侍衛，如乾清門侍衛。」³⁸這顯是將「乾清門侍衛」與「一、二、三等及藍翎侍衛」區分開，似值得商榷。關於侍衛的品級，順治十八年(1661)有一規定：「諭吏部，三等待衛、護軍校等陞補護軍參領，驟為三品太優。以後一等待衛、二等待衛補授護軍參領，仍為三品。三等待衛、護軍校等陞補護軍參領，其頂帶俸祿著為四品。」³⁹因護軍參領乃三品官，以此記載加以推斷，至少在順治十八年，三等待衛已定為正五品，此方有「驟為三品太優」之質疑，故其頂帶俸祿為四品。

或因史料零散之故，以往研究只提及領侍衛內大臣所轄的大門侍衛分等級，卻未提及內廷侍衛亦分等，學界對於御前與乾清門侍衛等級的瞭解似乎還只停留在內廷侍衛分「侍衛」與「行走」而已。

內廷侍衛中，在皇帝身邊日常侍從、值宿的稱「御前侍衛」、「御前行走」，稍次一級稱「乾清門侍衛」、「乾清門行走」。杜家驥、李然指出，行走「有服務、受差遣之義，有時也指派任而非專職的供職辦事」。⁴⁰「行走」最初是臨時差使，帶有「見習」之意(類似於觀政進士)，後逐漸成為定制。賞此銜者，可與侍衛一樣成為近御之臣，奉差執事。

關於「御前侍衛」與「御前行走」之別，徐珂《清稗類鈔》云：「御前行走與御前侍衛同官而有別，外藩蒙古王公及貝勒、貝子、八分公則稱行走，滿洲則稱侍衛。侍衛有額缺，行走無額缺也。」⁴¹從此記載來看，「侍衛」與「行走」名稱之別主要取決於族屬，蒙古稱「行走」，滿洲則稱「侍衛」，這確有不少例子。如那爾蘇同治四年

³⁵ 昭槿(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續錄卷一，頁378。

³⁶ 《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頁6393。

³⁷ 《清朝通志》，《十通》本，卷六八，頁7157。

³⁸ 商鴻逵等(編著)：《清史滿語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209。

³⁹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五，頁99；《(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五四二，頁6-7。

⁴⁰ 杜家驥、李然(編著)：《嘉慶事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頁88。

⁴¹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6年)，頁1365。參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竹葉亭雜記》(與趙翼《簞曝雜記》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一，頁18。

(1865) 襲科爾沁部多羅貝勒，⁴²同治十一年(1872)任御前行走。⁴³又如蒙古內扎薩克王貝勒，咸豐八年(1858)在御前行走。⁴⁴然而史料中更有大量蒙古內廷侍衛和滿人內廷行走的例子，遑論有漢人擔任內廷侍衛和行走的特例。而且，所謂「侍衛有額缺，行走無額缺」，似也不確。從筆者掌握的史料來看，不管是御前侍衛抑或行走，皆無定員。

另有一細節值得留意，乾隆十九年(1754)十二月，《清實錄》載：「庫克新瑪木特著授為內大臣，在御前行走。通瑪木特著授為散秩大臣，在乾清門行走。庫克新瑪木特之子車凌達什、得木齊達什敦多布俱授為三等侍衛。得木齊蘇珠克圖授為藍翎侍衛。」⁴⁵實錄中的「在御前行走」、「在乾清門行走」反映了恩寵程度，此有別於「御前行走」、「乾清門行走」職銜。「在御前行走」、「在乾清門行走」乃是動詞，「御前行走」、「乾清門行走」則是名詞，乃職官名。

事實上，內廷侍衛亦分一等、二等、三等與藍翎(另有較為特殊的四等侍衛，與藍翎侍衛多有分合，可視為同一等級)，品級與大門侍衛無異，⁴⁶然待遇有差。如圖爾哈圖曾任御前一等侍衛。⁴⁷寧秀曾任御前二等侍衛，乾隆四年(1739)為正紅旗滿洲副都統。⁴⁸安寧曾任御前二等侍衛，⁴⁹於乾隆十七年(1752)上「奏請以御前侍衛管理織造事」，⁵⁰並於同年赴任。⁵¹《衛藏通志》亦載伊昌阿等多名乾清門二等侍衛。⁵²再如乾清門頭等侍衛奕縉因「身軀軟弱，著退出乾清門，在大門上行走」。⁵³寶璽之孫蔭桓曾任乾清門頭等侍衛。⁵⁴康熙帝曾命乾清門頭等侍衛喇錫致書哲布尊丹巴呼圖

⁴²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審查委員會(審定)：《清史稿校註》(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86-1991年)，卷二一六，頁7249-50。

⁴³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三四一，頁491。

⁴⁴ 《禮志》(清史館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檔號：206000243，〈賓禮〉，頁二上。

⁴⁵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七八，頁1176-77。

⁴⁶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三，頁49；奕慶(著)、雷大受(校點)：《佳夢軒叢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73。

⁴⁷ 《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三九，頁519。

⁴⁸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百五，頁574。

⁴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後文簡稱《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71260。

⁵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宮中檔奏摺與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後文簡稱《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文獻編號：008839。

⁵¹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27372。

⁵² 袁昶：《(嘉慶)衛藏通志》，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漸西村舍刻本，卷六，頁二六上。

⁵³ 《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一九七，頁1107。

⁵⁴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三八六，頁11698。

克圖。⁵⁵京口駐防蒙古旗人桂森家族始祖塔賚，「從龍入關扈蹕有功，歷升御前一等侍衛」。⁵⁶

此外，道光帝曾命「御前頭等侍衛明慶、二等侍衛西凌阿、乾清門四等侍衛伊昌阿、藍翎侍衛穆騰阿、隨揚威將軍奕經馳往浙江聽候差委」。⁵⁷從行文來看，此處的西凌阿當是御前二等侍衛，穆騰阿則是乾清門藍翎侍衛。關於穆騰阿，只知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乾清門侍衛，等級不詳，然而從他在次年便升為御前頭等侍衛來看，⁵⁸道光二十一年穆騰阿等級必然不低，故所謂「藍翎侍衛」只可能是乾清門藍翎侍衛。正因乾清門侍衛亦分等，故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亦寫道：「這時內務府比以前忙多了，……要授甚麼『南書房行走』、乾清門各等侍衛。」⁵⁹

方志中所見漢人「御前侍衛」考辨

「御前侍衛」是清代侍衛中等級最高者，檢《增訂清文鑑》，其滿文釋文漢譯為：「自眾侍衛中選其善者，近侍主子，謂之『御前侍衛』。」⁶⁰對於御前侍衛的功能等並無描述，唯一的特點便是「近侍主子」，這也符合「御前」之意。

御前侍衛誕生較早，金梁《滿洲老檔秘錄》有「太宗大呼卻虎」條，其中提到有御前侍衛名詹土謝圖者，⁶¹然此書不甚可信。而據《清世祖實錄稿本殘卷》，崇德八年(1643)有「內大臣圖爾格及御前下(蝦)等皆從我謀」的記載，故此，御前侍衛在太宗時代已然存在。⁶²關於「御前」二字，《清實錄》乾隆六年辛酉(1741)十二月有一則史料值得留意：「昨頒賞太監等摺內書寫『御前小太監』，甚屬錯誤。從前魏珠、陳福，服勤日久，各有身分，稱為『御前太監』。再，侍衛大臣稱為『御前侍衛』，至新進小太監等，如何寫『御前』字樣？伊等要稱『御前』，即是狂妄！嗣後若有人如此稱謂，即著伊等參奏，爾等嚴傳禁止。如再有故意違犯者，定行究治！」⁶³從這則聖諭可知乾隆初年有太監冒用「御前小太監」的行為，從中亦可見「御前」兩字之尊貴，如嘉慶

⁵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頭等侍衛喇錫奏進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文稿〉，頁1670。

⁵⁶ 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179冊，光緒己丑(1889)恩科，頁427。

⁵⁷ 《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五七，頁447。

⁵⁸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3174-1號。

⁵⁹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頁83。

⁶⁰ 滿文釋文為 hiya sai dorgici sain ningge be sonjofi, ejen i hanci eršerengge be gicika hiya sembi。參見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頁十六上。

⁶¹ 金梁(輯)：《滿洲秘檔》(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29年版《滿洲老檔秘錄》，1967年)，頁187。

⁶² 《文獻叢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1930-1937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鉛印本，1964年)，頁552。

⁶³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五六，頁1223。

十八年(1813)諭「嗣後宮內圓明園值御門典禮，內閣學士宣本，大學士承旨時，御前大臣及御前侍衛俱毋庸退下，著為令」。⁶⁴由此可知，御前大臣和御前侍衛地位尊崇，待遇與諸臣有別。事實上，御前太監在太監中地位甚高，「宮內太監，有頂戴即有朝珠，然非御前太監，必須當差已逾三十年，方准得頂戴。而御前太監，又必須自幼淨身，方准充當，可謂慎矣」。⁶⁵有清一代，御前太監選拔甚嚴，「務取厚重樸實之人，其有年紀太輕、性情浮動者，屏勿使近」。⁶⁶御前大臣和御前侍衛更是如此：「設御前大臣，(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均無定員。)以王公勳戚大臣為之，位綦尊崇，如漢魏前後將軍之秩，職綦重焉。侍衛品級既有等倫，而職司尤有區別。若御前侍衛，多以王公、胄子、勳戚、世臣充之，御殿則在帝左右，從扈則給事起居，滿洲將相多由此出。」⁶⁷所謂「滿洲將相多由此出」，確是事實，如「紫光閣五十功臣」像中，依照陳金陵的統計，侍衛出身者約佔一半。⁶⁸

「御前」滿文為 *gocika*，來自動詞 *gocimbi*，⁶⁹音譯為「戈什哈」，⁷⁰亦有譯為「國齊哈」、「郭什哈」者，⁷¹是對清代大臣、大員所屬親隨聽差之親丁護衛的總稱，簡稱「戈什」，皇帝身邊的「戈什哈」則譯為「御前」。《清史稿》載：「御前侍衛、御前行走、乾清門行走，(俱侍衛內特簡。)無常員。(故事，凡宿衛之臣，惟滿員授乾清門侍衛，其重以貴戚或異材，乃擢入御前。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領侍衛內大臣轄之。其以材勇擢侍乾清門者，班崇極矣。惟嘉慶間楊芳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內大臣，歎為未有。)」⁷²「國什哈轄」滿文穆麟德轉寫為 *gocika hiya*，漢義類似前朝的「羽林」，⁷³譯名為「御前侍衛」。⁷⁴楊芳確在嘉慶和道光年間兩度任御前侍衛。⁷⁵至於所謂「漢國什哈內大臣」，更是空前絕後的殊榮。因「國什哈內大臣」即「御前大臣」，正

⁶⁴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九九，頁516。

⁶⁵ 福格：《聽雨叢談》，卷五，頁115。

⁶⁶ 《清史稿》，卷四三九，頁12401。

⁶⁷ 福格：《聽雨叢談》，卷一，頁25。

⁶⁸ 陳金陵：〈簡論清代皇權與侍衛〉，頁66；參見聶崇正：〈談清代《紫光閣功臣像》〉，《文物》1990年第1期，頁65-69。

⁶⁹ 商鴻達等：《清史滿語辭典》，頁102。

⁷⁰ 同上注，頁91。

⁷¹ 同上注，頁102。

⁷² 《清史稿》，卷一一七，頁3365。另，據筆者所涉，則例、會典事例等當朝官修史料似乎並未明確規定漢人無資格擔任御前侍衛與乾清門侍衛。這並不難理解，此乃潛規則，若明文規定，反而不利於統治，故僅見於《清史稿》等後世史料。

⁷³ 「羽林」始建於西漢，主要負責貼身護衛君王。漢武又置有所謂「羽林孤兒」，由陣亡將士後嗣整編而成。羽林也由此成為一種延續軍事傳統與家族榮譽的象徵，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與認可，成為後世君王效仿之制。羽林之名延續時間甚久，直至明朝仍有羽林衛。

⁷⁴ 商鴻達等：《清史滿語辭典》，頁102。

⁷⁵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56879-001；《清史稿校註》，卷一二四，頁3335；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3023-7號。

如前文所述，乃侍衛系統最高首腦，其地位高於正一品的領侍衛內大臣，或因御前大臣從無漢人擔任，故此在「國什哈內大臣」前加一「漢」字。⁷⁶

雖然漢人絕難擔任御前侍衛，方志卻有大量漢人擔任乾清門侍衛甚至御前侍衛的記載。然而細考之下，這些漢人無一例外均是「漢侍衛」，絕非乾清門或御前侍衛。

「漢侍衛」的設置年代據《清朝文獻通考》所載乃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無定員，有一、二、三等及藍翎之分，於武進士內簡用。⁷⁷挑補漢侍衛的具體規定在雍正元年(1723)正式出臺：「雍正元年十二月上諭：『今科中式武進士係元年所取，狀元授為一等侍衛；榜眼、探花授為二等侍衛；二甲十三名授為三等侍衛，令戴孔雀翎；三甲記名三十六人俱授藍翎；餘照例揀選補用。』」⁷⁸諭旨確立了從武進士中拔擢漢侍衛的標準，雍正二年(1724)照此遵行。該科武狀元苗國琮被授予頭等侍衛，⁷⁹榜眼呂傑為二等侍衛，⁸⁰探花茹銳亦為二等侍衛。⁸¹之後有清一代漢侍衛選拔皆照此標準，未有改動。⁸²其實此制康熙晚期或已有雛形，如五十二年(1713)武狀元李如柏便被授予頭等侍衛，⁸³榜眼丁士傑授二等侍衛。⁸⁴武狀元選為一等侍衛的，稱「漢一等侍衛」，榜眼、探花則稱「漢二等侍衛」，以此類推。⁸⁵

方志中有大量漢人御前侍衛的記載，如《福州府志》載蘇元琮和丁又顯為御前侍衛。⁸⁶查得蘇、丁二人為雍正癸卯恩科甲辰武進士，⁸⁷雖具體名次不詳，因不是前三

⁷⁶ 《清史稿校註》，卷一二四，頁3335。

⁷⁷ 《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頁6393。

⁷⁸ 《清朝通典》，卷二一，頁2147。該年的武進士選授侍衛確實照此行事，如榜眼畢映同年十二月放二等侍衛(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手抄本，1997年〕，第1冊，頁16)，二甲三名武進士宋愛授三等侍衛(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1298號)。

⁷⁹ 苗國琮為武狀元可參見《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七，頁411；朱彭壽：《舊典備徵》，卷四，頁83。《中研院史語所人名權威資料庫》將苗國琮記為一甲二名武進士，誤。參見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scgi/ttsquery?0:17470212:mctauac:TM%3D%AD%5D%B0%EA%D Az>。檢索日期：2016年7月3日。

⁸⁰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1冊，頁93。

⁸¹ 同上注，第1冊，頁520；第2冊，頁696。

⁸² 如乾隆朝便是如此，參見《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22731-001。

⁸³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21793。

⁸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1116號。

⁸⁵ 《清朝文獻通考》，卷八六，頁5623；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198。

⁸⁶ 魯曾煜等(纂)、徐景熹(修)：《福州府志》，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本，卷四五，頁一下；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二，頁一下；黃澄淵(修)、余鍾英等(纂)：《古田縣志》，民國三十一年(1942)鉛印本，卷二六，頁二二下；孫雲錦等(修)、吳昆田等(纂)：《淮安府志》，清光緒十年(1884)刊本，卷十四，頁六上。

⁸⁷ 《福建通志》，卷四二，頁七上、九上至九下。

名(該科三甲分別為李琰、畢映、施景範)，故二人至多被授予漢三等侍衛；而丁又顯在乾隆六年大河衛守備任上，被漕運總督常安參劾，革職問罪。⁸⁸故此，不管從科考名次抑或仕途加以判斷，二人均不可能如《福州府志》所載被授予御前侍衛。再如《湖南通志》和《溱浦縣志》皆記載諶萬芳乃是御前侍衛，⁸⁹《高安縣志》則稱之為乾清門侍衛。⁹⁰查得諶氏乃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恩科三甲武進士，僅被授予藍翎侍衛，與御前侍衛簡直又天壤之別。

《撫寧縣志》提及馬鴻圖乃「乾清門頭等侍衛」，⁹¹此人實為咸豐十一年(1861)武狀元，⁹²僅是漢頭等侍衛，⁹³而非乾清門頭等侍衛。《延慶州志》載「乾清門頭等侍衛」黃大元，⁹⁴查得此人是同治二年(1863)武狀元，⁹⁵授漢頭等侍衛。⁹⁶

《博羅縣志》載陳炳昭之子崇韜「乾隆乙卯武進士，以一甲第二名賜及第，乾清門二等侍衛」。既然是一甲第二名武進士，只能是漢二等侍衛，而不可能是乾清門二等侍衛。嘉慶元年(1796)冬，陳崇韜依然擔任漢二等侍衛，⁹⁷因「告假逾限」，於嘉慶五年(1800)被革去侍衛。⁹⁸

《廣東通志》載植璋乃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武進士，殿試一甲第二人，充御前二等侍衛」。⁹⁹顯然，此人乃漢二等侍衛而非御前二等侍衛。《豐潤縣志》提及乾隆丁丑科武狀元李國梁乃「御前頭等侍衛」，乙丑科武榜眼韓積善乃「御前二等侍衛」，道光六年(1826)武探花丁麟兆乃「御前二等侍衛」。¹⁰⁰實際上李國梁乃漢頭等侍衛，韓積善與丁麟兆則是漢二等侍衛。

⁸⁸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19510-001。

⁸⁹ 曾國荃等(纂修)：《湖南通志》，清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卷一九三，頁四十上；吳劍佩、陳整(修)，舒立淇(纂)：《溱浦縣志》，民國十年(1921)活字本，卷十七，頁四一上。

⁹⁰ 孫家鐸(修)、熊松之(纂)：《(同治)高安縣志》，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卷十二，頁六下。

⁹¹ 張上龢(修)、史夢蘭(纂)：《(光緒)撫寧縣志》，清光緒三年(1877)刻本，卷十一，頁十八下。

⁹²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九，頁241；朱彭壽：《舊典備徵》，卷四，頁86。

⁹³ 游智開(修)、史夢蘭(纂)：《永平府志》，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卷十四，頁十二下；《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文獻編號：115476。

⁹⁴ 何道增等(修)、張惇德(纂)：《延慶州志》，清光緒七年(1881)刊本，卷八，頁二十上。

⁹⁵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八一，頁651、659；朱彭壽：《舊典備徵》，卷四，頁87。

⁹⁶ 景佐綱(修)、張鏡淵(纂)：《懷安縣志》，察哈爾省印刷局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頁五一上。

⁹⁷ 《(清嘉慶元年冬)縉紳全書》，榮慶堂刊本，頁六七下。

⁹⁸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六，頁12。

⁹⁹ 阮元(修)、陳昌齊等(纂)：《廣東通志》，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卷二八七，頁二二下。

¹⁰⁰ 郝增祐：《豐潤縣志》，清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卷五，頁六一上至六二上；另，《永平府志》卷五九頁三三下亦稱李國梁為御前頭等侍衛。

再如楊大立，康熙六十年(1721)「以第二人及第，選御前侍衛，雍正元年遷乾清門頭等侍衛」。¹⁰¹此人確實為康熙辛丑科武榜眼，¹⁰²然而只是擔任漢三等侍衛，¹⁰³而非「御前侍衛」，之後亦一直在綠營擔任武將。¹⁰⁴

《黃縣太原王氏族譜》提到黃鴻中乃是「庚辰中式第十九名武進士，殿試二甲第六名，欽點御前侍衛，賞戴花翎，乾清門行走加一級」。¹⁰⁵顯然，黃鴻中只能是三等侍衛；而所謂「欽點御前侍衛、乾清門行走」云云，很可能只是因為編纂者對於侍衛的等級不甚了了所致。

《湖南桂陽泗州寨陳氏續修宗譜》提及一位陳厚湛，由其弟陳厚渾所寫：「二兄魁梧奇偉，弓馬過人，甲辰入泮越，戊申中武魁，己酉成進士，欽點御前翎藍〔藍翎〕侍衛，乙卯賞戴花翎，授廣東韶州府左營守備。」¹⁰⁶從描述來看，陳厚湛乃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甲武進士，授漢藍翎侍衛，乾隆六十年(1795)賞戴花翎。以此為線索查考可知，陳厚湛名「揚鷹」，¹⁰⁷同治《桂陽直隸州志》亦載他獲「欽點御前藍翎侍衛」，¹⁰⁸確實曾任廣東韶州守備，¹⁰⁹還曾任清遠營參將。¹¹⁰顯然，陳揚鷹不可能是御前藍翎侍衛，只是漢藍翎侍衛。

道光《巨野縣志》載：「郭琳，魯藩長子，字貢方，武進士，授御前一等侍衛，……後累官至威寧鎮總兵。」¹¹¹查道光《大定府志》可知此人確實曾任侍衛，並於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八日任大定鎮總兵。¹¹²顯然郭琳只可能是漢侍衛，而非御前侍衛。

¹⁰¹ 胡德琳(修)、李文藻等(纂)：《(乾隆)歷城縣志》，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卷三八，頁二十下至二一上；王贈芳、王鎮(修)，成瓘、冷烜(纂)：《(道光)濟南府志》，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卷五三，頁十八下至十九上。

¹⁰² 朱彭壽：《舊典備徵》，卷四，頁83。

¹⁰³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1冊，頁592。

¹⁰⁴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20052、043474、141830。

¹⁰⁵ 王基鴻等(修)：《黃縣太原王氏族譜》，清宣統元年(1909)刻本，卷三，頁四五上。

¹⁰⁶ 陳桂森、陳鏡清等(修)：《湖南桂陽泗州寨陳氏續修宗譜》，民國六年(1917)惇庸堂刻本，〈紀畧行述〉，陳厚渾〈厚湛事畧〉，頁四六下。

¹⁰⁷ 巴哈布、翁元圻等(修)，王煦、羅廷彥(纂)：《(嘉慶)湖南通志》，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刻本，卷一百，頁三五上；《湖南桂陽泗州寨陳氏續修宗譜》，〈紀畧行述〉，陳厚渾〈贊信公行述〉，頁十九下。

¹⁰⁸ 汪敷灝(修)、王闔運(纂)：《(同治)桂陽直隸州志》，清同治七年(1867)刻本，卷十八，頁十一上。

¹⁰⁹ 《(嘉慶)湖南通志》，卷一百，頁十二；額哲克等(修)、單興詩(纂)：《(同治)韶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卷六，頁十三上；《(光緒)湖南通志》，卷一四五，頁四上。

¹¹⁰ 《(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五九，頁二十下。

¹¹¹ 黃維翰(纂修)、袁傳裘(續纂修)：《(道光)巨野縣志》，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續修刻本，卷二四，頁九上。

¹¹² 黃宅中(修)、鄒漢勛(纂)：《(道光)大定府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卷二三，頁十五上。

漢人中比較知名的「御前侍衛」乃是乾隆年間的薛樹英，有「鐵臂樹英」之稱，¹¹³生平甚至被拍成電影，片名便是《御前侍衛》。¹¹⁴在薛樹英家鄉勝芳，亦建有一所御前侍衛府。¹¹⁵實際上，薛氏乃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科三甲武進士，選為藍翎侍衛，¹¹⁶乾隆四十年(1775)在鑾儀衛當差。¹¹⁷後任江南六安營參將，¹¹⁸五十二年(1787)任壽春營中營遊擊，¹¹⁹五十三年(1788)任鎮標中營遊擊。¹²⁰不管是從出身抑或仕途來看，薛樹英都不可能是內廷侍衛等級最尊崇的「御前侍衛」。

類似方志史料數不勝數，不贅舉。總之，方志中這些所謂漢人「御前侍衛」或「乾清門侍衛」皆是漢侍衛，無一例外。方志編纂者似乎對侍衛等級缺乏瞭解，往往將漢侍衛(即便是最低等級的漢藍翎侍衛)誤認為御前侍衛或乾清門侍衛。就筆者所知，方志中對於其他職官並無如此大規模的訛誤出現，為何唯獨涉及侍衛制時如此漏洞百出，原因何在？

「御前侍衛」的兩種語境

乾隆四年己未科武殿試金榜探花羅英笏，自稱「賜進士探花及第，御前侍衛，原任浙江定海舟山總兵官，獲理提督軍務，年姻家眷，弟羅英笏拜題」，¹²¹此稱呼相當正式，羅英笏不可能將自己的侍衛等級弄錯。另外，參與康熙四十二年(1703)武舉殿試的考官黃如瑾在其《溧陽仙山黃劬雲年譜》中記載：「九月十一日奉命分校武闈，欽賜表裏各一端。廿五日撤棘，余得士二十五人。冠本房者會元曹維城也，廷試仍居第一，與二甲孫四知、李庸、袁國琮、李燦、馬觀伯、時為煥、吳方熹、王萬化、葛寅、李斯援、宮夢熊等十二人俱欽點御前侍衛。」¹²²可見，不論是在考官抑或考生

¹¹³ 吳志國(主編)：《這裡是勝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頁195。

¹¹⁴ 見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044751/>。檢索日期：2015年12月31日。

¹¹⁵ 見 <http://www.sfgz.gov.cn/Item/Show.asp?m=1&d=1131>；<http://www.sfdzh.com/thread-283263-1-1.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31日。

¹¹⁶ 《(清乾隆四十二年秋)縉紳全書》，世錦堂刻本，頁五七下。

¹¹⁷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81707-001。

¹¹⁸ 《文安縣志》也說薛樹英擔任御前侍衛，然而這沒有史料依據，也不符合常識。見陳楨(修)、李蘭增等(纂)：《(民國)文安縣志》，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卷四，頁五三上；陳楨(修)、李蘭增等(纂)、《文安縣志》編譯組(譯注)：《文安縣志譯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冊，頁229。

¹¹⁹ 朱士達(修)，喬載繇、湯若荀(纂)：《(道光)壽州志》，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卷二五，頁十九上；沈葆楨、吳坤修等(修)，何紹基、楊沂孫等(纂)：《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清光緒四年(1878)刻本，卷一三六，頁二十上。

¹²⁰ 《(清乾隆五十三年春)中樞備覽》，西榮慶堂刻本，頁一百三十上。

¹²¹ 祖國鈞(纂修)：《蓮湖祖氏族譜》，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卷二，頁二百二下。

¹²² 黃如瑾(編)、黃夢麟等(補編)：《溧陽仙山黃劬雲年譜》，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木活字本，卷二，頁四七上。

看來，漢侍衛也可視為御前侍衛。換言之，將「漢侍衛」稱為「御前侍衛」雖不合規制，但似乎也為官方默許，「御前侍衛」或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御前侍衛」包含漢侍衛，狹義則僅指內廷侍衛之等級最高者。事實上，不僅是漢人有這種誤會，滿人亦如此，如《鄂文端公年譜》載：「乾隆四年己未，公年六十歲。□月，鄂弼入學，鄂弼乃容安第三胞弟也，入順天府學。□月，欽點鄂弼侍衛。弼于□年□月皇上親簡大臣中可備侍內庭者，……遂授御前侍衛。」¹²³然而，鄂弼在乾隆五年（1740）只是三等侍衛，¹²⁴結合其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也僅是乾清門行走來看，¹²⁵此三等侍衛並非「御前三等侍衛」。故此，鄂弼所授「御前侍衛」乃是廣義，而非狹義。

事實上，關於廣義與狹義之別，在「內大臣」這一職官的演變上似亦有痕跡。關於「內大臣」與「領侍衛內大臣」，康熙版《御製清文鑑》並無單獨的「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領侍衛內大臣）」條目，僅有「dorgi amban（內大臣）」，滿文釋義為：hiya be kadalara dorgi amban, dorgi ambasa be, gemu dorgi amban sembi. jai dorgi amban i jergi de yaburengge be, sula amban sembi，¹²⁶漢譯為「領侍衛內大臣、內諸大臣，俱稱內大臣。又，論內大臣之品，曰散秩大臣」。此一釋義令人費解。乾隆版《御製增訂清文鑑》有獨立的「領侍衛內大臣」條目，至於「內大臣」條的釋義，則是把康熙版「論內大臣之品」等句刪除。¹²⁷故此，或許在康熙年間，「內大臣」稱呼乃是廣義，即便是「領侍衛內大臣」，亦屬於「內大臣」的範疇，這與後世狹義的「內大臣」有別。

此處需指出，康熙二十九年（1690）雖已經從武進士中選拔侍衛，¹²⁸然而直到雍正元年武進士中遴選漢侍衛的詳細方案才出臺。因此，康熙朝或會將「漢侍衛」泛稱為「御前侍衛」，原因或是這種約定俗成的稱謂在規定出臺後依然存在。

至於方志中有大量將「漢侍衛」錯誤地歸類為「乾清門侍衛」，則是明顯的訛誤，或只能歸為對侍衛制缺乏瞭解所致。這便如同即便是專研清代的史家，亦多有不明瞭了「御前大臣處」（gocika amban i ba）這一機構之存在者。

同治六年（1867）冬《縉紳全書》有一份該年的侍衛名單，其「御前頭等侍衛」條載：「張蜀錦，直隸廣平人，乙丑狀元；韓金甲，山東濟南人；黃大元，直隸懷安人，癸亥狀元；溫長湧，直隸天津人，癸丑狀元；馬鴻圖，直隸撫甯人，庚甲狀元；史天祥，直隸邯鄲人，壬戌狀元。」¹²⁹上述羅列諸人均是武狀元，故都是漢頭等

¹²³ 鄂容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清鈔本，頁264—65。

¹²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5847號。

¹²⁵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77669。

¹²⁶ 馬齊、馬爾漢等：《御製清文鑑》，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收入阿爾泰語研究所（編纂）：《阿爾泰語資料集》（韓國大邱市：曉星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78—1982年），第3—4輯，頁61c。

¹²⁷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四，頁三下。

¹²⁸ 常江、李理：《清宮侍衛》，頁78；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卷一三四，〈兵部職方司·陞選通例上〉，頁四下。

¹²⁹ 《（清同治六年冬）縉紳全書》，北京榮祿堂刊本，頁八四上至八六上。

侍衛，而非「御前頭等侍衛」。值得注意的是，此《縉紳全書》係北京榮祿堂刊本，乃坊刻本而非官刻本。坊刻本稱呼不一，如《爵秩全本》、《縉紳全書》、《中樞備覽》、《縉紳全本》、《縉紳新書》、《滿漢爵秩新本》、《滿漢縉紳新本》、《大清仕籍全編》、《爵秩全函》、《大清縉紳全書》等等，且會標註「榮祿堂」、「榮華堂」、「榮晉齋」等坊號。官刻本則似只有《爵秩全覽》這一固定稱呼，故此現存記載內務府官員履歷的縉紳錄亦只稱《內務府爵秩全覽》。¹³⁰

筆者發現絕大多數坊刻本縉紳錄均將「侍衛處」稱為「御前侍衛府」，或將「漢侍衛」稱作「御前侍衛」。¹³¹極少數縉紳錄將「侍衛處」稱為「侍衛府」，其中所錄皆武進士出身。¹³²現存官刻本較之坊刻本要少很多，皆無「御前侍衛府」這一稱謂，僅有「侍衛處」，¹³³這與規制相符。筆者以為方志中的將漢侍衛錯誤地認為是「御前侍衛」，或

¹³⁰ 光緒丙子秋季《內務府爵秩全覽》，清刻本；光緒乙巳秋季《內務府爵秩全覽》，清刻本，並收入王春瑜（編）《中國稀見史料》（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輯，第14冊；四川大學東亞漢籍研究所藏光緒七年辛卯（1881）夏季《內務府爵秩全覽》、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秋季《內務府爵秩全覽》、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秋季《內務府爵秩全覽》。

¹³¹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春《大清摺紳全書》，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寶名堂刻本，頁六八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春《大清摺紳全書》，榮錦堂本，頁六七上；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春《滿漢爵秩全本》，京都琉璃廠榮錦堂本，頁六七上；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春《大清縉紳全書》，榮錦堂本，頁六九下；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秋《大清摺紳全書》（未注明版本資訊，據「台號、籍貫隨到隨補」等廣告語，疑似榮祿堂本），頁五六下；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夏《大清摺紳全書》，京都琉璃廠寶名堂本，頁六二上；《（清乾隆五十三年春）縉紳全書》，西榮慶堂刻本，頁六七上；《（清乾隆三十年春）縉紳全書》，寶名堂刻本，頁六七上至六八下；《（清乾隆四十二年秋）縉紳全書》，頁五五下至五八上；《（清乾隆三十三年秋）爵秩全本》，榮錦堂刻本，頁五六上至五七上；《（清光緒六年春）縉紳全書》，榮華堂刊本，頁九三下至九六上；《（清光緒三十二年春）中樞備覽》，北京榮祿堂刊本，頁二八上；《（清光緒六年春）中樞備覽》，榮華堂刊本，頁四八上；《（清光緒二十九年秋）中樞備覽》，北京榮寶齋刊本，頁五上至八下；《（清光緒三十年春）中樞備覽》，北京榮祿堂刊本，頁二八下至三四上；《（清同治十二年秋）中樞備覽》，北京榮祿堂刊本，頁二十上；《（清光緒二年夏）縉紳全書》，北京斌陞堂刊本，頁八九上至九二上；《（清同治十三年冬）縉紳全書》，北京榮晉齋刊本，頁八九上至九二下；《（清同治十三年秋）縉紳全書》，榮祿堂刊本，頁八九上至九二下；《（清同治十二年冬）縉紳全書》，北京榮祿堂刊本，頁八九上至九二下；《（清同治十二年秋）縉紳全書》，北京榮祿堂刊本，頁八九上至九二下；《（清同治九年秋）縉紳全書》，北京榮晉齋刊本，頁八九上至九二下；《（清光緒十年春）縉紳全書》，北京榮華堂刊本，頁九二下至九六上；《（清同治八年冬）縉紳全書》，榮祿堂刊本，頁九十上至九二上。筆者接觸到的所有坊刻本幾乎都是如此。

¹³²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冬《摺紳冊便覽》，崇壽堂刊本，頁九二上；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春《大清職官遷除題名錄》（即《摺紳冊便覽》），崇壽堂刊本，頁六二上。

¹³³ 《（清光緒二十四年秋）爵秩全覽》（刻本），頁二七；《（清光緒二十五年秋）爵秩全覽》（刻本），頁二八；《（清光緒二十五年春）爵秩全覽》（刻本），頁二七至二八。

與坊刻本中的這些「御前侍衛府」，皆屬廣義的「御前侍衛」。換言之，「御前侍衛」乃民間對侍衛的泛稱，或許在普羅大眾的認知中，侍衛便是在「御前當差」，因此皆是「御前侍衛」，這與規制中等級最高的「御前侍衛」迥然不同。這亦能解釋為何至今民間尚存一些漢侍衛的「御前侍衛」碑，¹³⁴甚至還有「御前侍衛府」的故址。¹³⁵

侍衛制是滿人優先的制度，與漢人有隔膜，且侍衛的特性決定其乃天然的「內官」，尤其是御前、乾清門侍衛乃內廷之職，常年深居內宮，外人無從知曉，編纂方志的多為漢臣，對該制度缺乏瞭解。此外，內廷侍衛一旦外派，其承擔之責亦頗為神秘，往往承擔絕密任務，如雍正帝曾密令各省督撫搜集年羹堯的罪證，河南巡撫田文鏡便密差時在河南的侍衛白琦混入年羹堯車隊，伺機蒐集情報。¹³⁶雍正三年（1725）五月十九日，雍正帝著令時在年羹堯帳下效力的高其倬回京，¹³⁷而據《永憲錄》載，一同返京的還有侍衛查爾扈。¹³⁸由雲貴總督高其倬十一月十二日（此時距年羹堯問斬只差半月）的奏摺可知，其弟高其倬原先一直在年羹堯帳下。年羹堯倒臺後，高其倬蒙恩升授三等侍衛。¹³⁹以此觀之，高其倬或也是在年氏帳下蒐集情報。

關於此種刺探情報之職，《郎潛紀聞》所載甚詳，且頗具戲劇性：

相傳世宗在位，嫉臣下紀綱之不肅，苞苴之盛行，凡關防風憲衙門，多密遣親信邏察，以故萬里若堂階。世所述軼事甚夥，以未見紀載，不敢筆也。《海濱人物抄存》稱天津周撫部人驥，雍正丁未進士，以禮部主事視學四川，（按：《清祕述聞》作以戶部郎中任。）三年，操守清潔無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薦一僕，甚勤敏，至任滿，數請先行。公曰：「我即日回京覆命，若當隨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命耳。」公驚詢，乃曰：「某實侍衛某也，特來伺公。公考試好，某將先期奏聞矣。」公歸，果蒙褒旨。公弟人騏為公立傳，敘其事甚詳。¹⁴⁰

¹³⁴ 見《屈當石堯20載 碑主竟是道光御前侍衛》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03/12/content_2176686.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31日。

¹³⁵ 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63d4f01019y5g.html；<http://www.hacszp.com/show.aspx?id=87&act=article>；<http://www.sfgz.gov.cn/Item/Show.asp?m=1&d=1131>；<http://www.dalnews.cn/newspaper/tour/20090422/194540.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31日。

¹³⁶ 《宮中檔硃批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田文鏡〈奏報年羹堯過省車輛數目等清單〉，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檔案號：0401300513002。

¹³⁷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二，頁490。

¹³⁸ 蕭爽（著）、朱南銑（校點）：《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三，頁187。

¹³⁹ 《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文獻編號：402012566；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1980年），第5輯，頁350。

¹⁴⁰ 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三筆，卷四，「世宗伺察之嚴」條，頁716-17。

正因擔任這類絕密任務的皆是深受皇帝信任的內廷侍衛，「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一切差使，俱係特旨指名差派。若派往出征，自與尋常派往侍衛官員不同」。¹⁴¹這或是為何查閱官修的《爵秩全覽》和坊刻的各類縉紳錄，皆不透露內廷侍衛的人員構成與名單。縉紳錄中的所謂「御前侍衛」都是漢侍衛，這種低階侍衛並不會承擔此種絕密任務，因此名單得以在縉紳錄中公佈。

「大門侍衛」初探

領侍衛內大臣統領侍衛處，所轄主體為「大門侍衛」。那麼，何謂「大門侍衛」？官修史料中並無明確界定，反倒是清代野史筆記中有相關記載：「大門侍衛，即大清門侍衛，值班不在大清門，而在乾清門。若乾清門侍衛，則皆王公大臣，名御前侍衛，其位甚尊。外人不知，每混大門侍衛為乾清門侍衛，其人自稱亦曰乾清門侍衛，其實非也。此等侍衛分一二三等，皆每科武殿試榜下取用者。」¹⁴²上述材料對於大門侍衛的解釋可謂簡明，從中亦可知大門侍衛主要由武進士中選撥。然而亦有不少明顯訛誤，如將「乾清門侍衛」與「御前侍衛」混為一談，且大門侍衛並非值宿「乾清門」，而在「大清門」。誠如奕賡所言，「大門侍衛之仰望乾清門侍衛，有若天上神人」。¹⁴³若大門侍衛亦值宿乾清門，當不會有此種巨大差異。

那麼，為何會有乾清門侍衛和大門侍衛之別？或因乾清門是內外廷相區分的標誌。天下初定之時，內廷似無治理政務之所，故順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庚申福臨親政是在外廷太和殿：「御太和殿，諸王羣臣上表行慶賀禮。是日，頒詔大赦天下。」¹⁴⁴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乾清宮重修完畢才在乾清宮辦公：「去歲欲修造乾清宮，念被水災民，方加恩恤，是以未即興工。今正宮為后妃所居，朕無治理政務之所，因居便殿視事。現在應否修造，著會議具奏。」¹⁴⁵內田直文將乾清門的重修視為標誌，自此方有內廷與外朝之別。故此，內廷在史料中又可稱「內朝」。¹⁴⁶筆者以

¹⁴¹ 阿桂、和坤等（纂修）：《欽定戶部軍需則例》，清乾隆五十年（1785）刻增修本，卷二，頁四下。

¹⁴² 張祖翼：《清代野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7–58。參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3冊，頁129；天台野叟（撰）、許朝元（校點）：《大清見聞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卷，頁215。

¹⁴³ 奕賡：《佳夢軒叢著》，頁67。

¹⁴⁴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五二，頁410。

¹⁴⁵ 同上注，卷八八，頁690。

¹⁴⁶ 如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高宗為內禪做準備，對於皇太子永琰出入的儀仗規定如下：「皇太子出入內朝，於現例所有導從侍衛二員外，加添二員。並隨班輪派乾清門侍衛二員導從出入。如出外朝及城市內外，除例隨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外，添派乾清門侍衛四員、領侍衛內大臣一員，帶領前設虎槍三對、後設豹尾槍八桿。」（《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486，頁867–68）

為大門侍衛的出現應早於乾清門侍衛，因在順治十二年乾清宮重修之前，並無設立乾清門侍衛的必要。然而這僅是猜想，史料並無明確記載。¹⁴⁷

乾清門侍衛也「由大門侍衛選其優者充之」。¹⁴⁸從現存的宮中檔和軍機處檔摺件來看，即便是在光緒年間，除特授外，被選為內廷侍衛者皆原為大門頭等侍衛，且絕大多數均為上三旗滿人。¹⁴⁹關於大門侍衛的選拔，嘉慶十七年(1812)十月規定：

諭內閣，大門侍衛每逢朕出入，均有前後扈蹕。近御差使，其挑選自應設定章程，以昭慎重。嗣後凡屆挑選侍衛之期，除本處侍衛仍照例升等外，其餘藍翎侍衛員缺，著於各項拜唐阿、前鋒、護軍內挑選帶領引見，不准將馬甲、閒散入選。其馬甲、閒散內如有二品以上大員子弟，仍准入選。其三品以下官員子弟，亦不准入選。¹⁵⁰

可見即便是侍衛系統裡等級較低的大門侍衛，遴選亦頗嚴格，對出身有相當要求。

有學者認為「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以外的侍衛皆可稱「大門上侍衛」或「三旗侍衛」，漢人只能擔任大門上侍衛，¹⁵¹此說有誤。「三旗侍衛」(或「上三旗侍衛」)與「大門侍衛」(或「大門上侍衛」)屬不同範疇。「三旗侍衛」代表出身，即該侍衛出身上三旗。或因皇帝的包衣系統出自上三旗，故此上三旗侍衛亦稱為「包衣侍衛」，滿文為 *boo i hiya*，音譯為「包衣下」，¹⁵²歸侍衛處管轄。¹⁵³乾隆四十年規定：「黏竿處〔一作尚虞備用處〕侍衛不敷應差，由三旗大門侍衛內挑取二等侍衛四員，作為黏竿侍衛班長之缺。三侍衛、藍翎侍衛各十五員在黏竿處當差，共定為三十四缺，仍入大門侍衛額數，照舊進班。遇大門侍衛升等之時，將黏竿處班長、二等侍衛一體升補。」¹⁵⁴尚虞備用處侍衛比較特殊，即使人手不夠，亦需由親信擔任，故從皇帝自將的上三旗大門侍衛中挑選任用。三旗侍衛因出身上三旗，清廷更為親信。即令到了宣統元年(1909)三月，隨從監國攝政王的大門三旗侍衛依然受賞，其他侍衛則不在受賞之列。¹⁵⁵

至於「大門侍衛」則代表職能。大門侍衛涵蓋範圍很廣，「上駟院侍衛，司轡、司鞍侍衛，茶膳房侍衛，傘上侍衛，奏蒙古事侍衛，尚虞備用處、粘杆處侍衛，鷹

¹⁴⁷ 《清實錄》中關於乾清門侍衛的最早記載是康熙十二年(1673)五月丙子，令乾清門侍衛武格馳驛往迎巴林淑慧公主。參見《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四二，頁559。

¹⁴⁸ 奕賡：《佳夢軒叢著》，頁70。

¹⁴⁹ 《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文獻編號：408018424-2、408018422-4。

¹⁵⁰ 《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六二，頁551。

¹⁵¹ 王鏡輪、向斯：《明清禁衛軍密檔》(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8年)，頁177。

¹⁵² 萬依(主編)：《故宮辭典》(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年)，頁546。

¹⁵³ 商鴻達等：《清史滿語辭典》，頁36。

¹⁵⁴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五四三，頁10；卷一千一百六，頁4。

¹⁵⁵ 《宣統政紀》，卷十一，頁227。

鷓房、鶻房、狗房侍衛，十五善射及善騎射、善射鵠、善強弓、善撲等侍衛，均無專額，統歸大門侍衛額數。¹⁵⁶換言之，單就編制而言，在紫禁城當差的除內廷侍衛之外，皆可稱「大門侍衛」。直到清末，「大門侍衛」之稱呼依然存在，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德宗頒佈《定國是詔》，開啟戊戌變法，其中便提到：「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業。」¹⁵⁷

「頭等侍衛」等同于「一等侍衛」

無論是「一等侍衛」亦或「頭等侍衛」，史料皆有大量記載。如寶鏗之孫蔭桓乃光緒二十四年進士，後改乾清門頭等侍衛。¹⁵⁸刑部右侍郎勵杜訥死後，康熙帝曾派乾清門一等侍衛副都統馬武賜御書「於其家，并令至其墓奠茶酒」。¹⁵⁹然而，史書中並無「一等侍衛」與「頭等侍衛」等同的記載，亦無學者就此問題進行考察。就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二者確實等同。「一等侍衛」當是正式稱謂，「頭等侍衛」則是俗稱。在漢文語境下，這主要基於兩個證據。證據一是漢侍衛的選拔，如《清史稿》載：「馬全，字具堂，山西陽曲人，初名琮。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武進士。自二等待衛出為福建撫標右營遊擊，與同官爭言，奪職。更名，寄籍大興。二十五年〔1760〕，會試再中式，上御紫光閣校閱，見全識之，問曰：『爾馬琮耶？』全叩頭謝罪，遂成一甲一名武進士，授頭等侍衛。」¹⁶⁰馬全第二次得中武進士，且是狀元，授「頭等侍衛」。然而自雍正元年開始漢侍衛的選拔已成定例(詳見前文所述)，如鄂爾泰在奏摺中，將武進士出身被選為藍翎侍衛者稱為「漢藍翎侍衛」。¹⁶¹再如胡經綸乃「漢二等待衛」，¹⁶²查得此人為廣東順德人，乾隆十年(1745)武探花，授二等待衛符合規制。¹⁶³馬全因是「一甲一名武進士」，按清廷規定，當授為「一等侍衛」，然而《清史稿》又指他被授予「頭等侍衛」，故二者等同。

證據二體現在官職品級上，如奕賡《侍衛瑣言》提到：「每旗各有領侍衛內大臣二員，係武職正頭品。」¹⁶⁴又如《清實錄》載：「尋奏隨從頭品以下、三品以上、文武大臣等賞半年俸銀。」¹⁶⁵可見，「頭品」當是「一品」的俗稱，「頭等侍衛」之於「一等侍衛」

¹⁵⁶ 奕賡：《佳夢軒叢著》，頁70。

¹⁵⁷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一八，頁482。

¹⁵⁸ 《清史稿》，卷三八六，頁11698。

¹⁵⁹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一九，頁211。

¹⁶⁰ 《清史稿》，卷三三四，頁11003。

¹⁶¹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54007-001。

¹⁶² 同上注，登錄號：026987-001，〈奏參漢侍衛告假回籍逾限多領俸祿應與失查各員交部察議並酌議支俸規條〉。

¹⁶³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五一，頁241；朱彭壽：《舊典備徵》，卷四，頁84。

¹⁶⁴ 奕賡：《佳夢軒叢著》，頁62。

¹⁶⁵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八二，頁25。

亦當是這種情況，這與《清實錄》載「惟大學士、尚書俱係頭等大臣，准照一品例」的描述類似。¹⁶⁶再如，史書上常見的所謂「頭品頂戴」，其實便是「一品頂戴」，二者等同。實際上，「一等」與「頭等」之別只存在於漢文語境下，若從滿文角度來看，問題並不存在，因不管是「一等侍衛」抑或「頭等侍衛」，滿文轉寫均記作 *uju jergi hiya*。¹⁶⁷既然「一等侍衛」即「頭等侍衛」，那麼「末等侍衛」亦容易理解，僅是口語詞，當指「藍翎侍衛」，如〈諾木齊奏請旗員引見時不得佩刀摺〉提到：「竊奴才至粗極陋，自末等侍衛，蒙皇上施恩，超拔為滿洲旗副都統。」¹⁶⁸

「四等侍衛」考辨

四等侍衛、藍翎侍衛就等級而言皆在三等侍衛之下，雍正三年下旨在藍翎侍衛中選勇士為四等侍衛。¹⁶⁹可見四等侍衛乃從藍翎侍衛中擇優錄取，且無定員。¹⁷⁰但到乾隆二年（1737），四等與藍翎侍衛再次合流：「四等侍衛與藍翎侍衛品級相同，毋庸別立班次，歸入藍翎侍衛班內，一例揀選，送部引見，恭候簡用。」¹⁷¹然而，乾隆七年（1742）議准再次分流：「嗣後三等侍衛降一級調用者，授為四等侍衛；四等侍衛降一級調用者，授為藍翎侍衛。藍翎侍衛降一級調用者，革職。」¹⁷²故此，四等侍衛等級較藍翎侍衛為高。

宗室侍衛因身份特殊，本歸宗人府管轄，然挑補侍衛又須經領侍衛內大臣辦理，程序極為繁瑣。故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高宗認為宗室侍衛「皆係在侍衛上當差，原當一體辦理」。¹⁷³嗣後挑取侍衛，令宗人府會同領侍衛內大臣共同揀選。

宗室侍衛亦分等級，如明興、和保都曾為宗室三等侍衛。¹⁷⁴常江、李理在《清宮侍衛》一書認為四等侍衛僅用於宗室三等侍衛降黜後的等級，¹⁷⁵此說法可能源於奕賡《侍衛瑣言》的記載：「宗室侍衛無藍翎，凡三等，降一等則為四等，覺羅、滿蒙人員則為藍翎矣。」¹⁷⁶賴惠敏論及藍翎侍衛時指出：「奕賡著《侍衛瑣言》提及：『侍衛分頭

¹⁶⁶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四一，頁398。

¹⁶⁷ *Uju* 音譯為「烏珠」、「烏柱」、「兀柱」。這其實在女真語裡便有，比如金朝名將「兀朮」便是此詞之音譯。參見商鴻達等：《清史滿語辭典》，頁204。順帶一提，關於「兀朮」是否即 *uju*，金啟琮似有不同說法。

¹⁶⁸ 《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1670。

¹⁶⁹ 王鏡輪、向斯：《明清禁衛軍密檔》，頁193；《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頁6393；《清朝通典》，卷三一，頁2196。

¹⁷⁰ 《清朝文獻通考》，卷七九，頁5590。

¹⁷¹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五六一，頁276。

¹⁷² 同上注，卷五百六十，頁259。

¹⁷³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八一，頁666。

¹⁷⁴ 《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百六，頁432；卷二八一，頁848。

¹⁷⁵ 常江、李理：《清宮侍衛》，頁28。

¹⁷⁶ 奕賡：《佳夢軒叢著》，頁65。

等、二等、三等、四等及藍翎侍衛，惟滿洲、蒙古充之。』……故漢軍當侍衛者機會等於零。」¹⁷⁷此處似乎引文有誤，理解更有差池。原文為：「侍衛，清語曰『轄』，分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及藍翎。藍翎侍衛無宗室，惟滿洲、蒙古及覺羅充之。」¹⁷⁸奕賡的本意並非說侍衛只由滿洲、蒙古擔任，而是特別針對藍翎侍衛而言。因較之花翎，藍翎(lamun funggala)等級太低，民間稱之為「野雞翎子」，對宗室而言有失體面，如「凡侍衛充喜起舞者，無論何等，俱戴紅寶石，冠頂藍翎者不許充當」。¹⁷⁹故此，藍翎只由滿洲、蒙古及覺羅擔任，「藍翎侍衛無宗室」。且漢軍亦不無機會擔任侍衛，考索史料可知，漢軍出身的侍衛比比皆是。

儘管宗室侍衛身份高貴，然「四等侍衛僅用於宗室三等侍衛降黜後的等級」實屬對《侍衛瑣言》的誤讀，「降一等則為四等」未必意味著四等侍衛僅用於宗室三等侍衛降黜後的等級，因侍衛系統的升調是可逆的，靈活的，往往因事革職。如興兆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散秩大臣，嘉慶四年(1799)任荊州將軍，次年降為四等侍衛，後又升二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¹⁸⁰孫得功後人孫慶長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乾清門三等侍衛，嘉慶二年(1797)降為藍翎侍衛，四年升二等侍衛，五年升頭等侍衛，嘉慶十三年(1808)又降為四等侍衛。¹⁸¹

因「宗室侍衛無藍翎」，最低乃四等侍衛，故宗室若初入侍衛之途，一般是先選為三等侍衛；亦有天姿不敏者賞為四等侍衛，之後才依次升補。¹⁸²如嘉慶十一年(1806)，閒散宗室永志因「守分遵法」而被恩賞為四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¹⁸³嘉慶二十三年(1818)，宗室康保因射術精湛，仁宗特命「加恩賞給四等侍衛，來京在大門上行走」。¹⁸⁴宗室靈熙第六子文治「蒙恩賞給四等侍衛」後，靈熙還特此恭折叩謝。¹⁸⁵再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以四等侍衛雅郎阿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¹⁸⁶嘉慶二十二年(1817)，宗室敬徵因對海康習紅陽教一事失察而被褫職，謫居盛京。尋被授予四等侍衛，起復任用。¹⁸⁷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詔布奕經等勞師糜餉、誤國殃民罪狀，逮京論大辟」。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被「予四等侍衛，充葉爾羌幫辦大臣」。¹⁸⁸上述例子中，授予四等侍衛並非懲罰，反而是起復的標誌。

¹⁷⁷ 賴惠敏：《清代的皇權與世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72。

¹⁷⁸ 奕賡：《佳夢軒叢著》，頁62。

¹⁷⁹ 同上注，頁64。

¹⁸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5695號。

¹⁸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1804-1號。

¹⁸²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頁1197。

¹⁸³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五，頁79。

¹⁸⁴ 同上注，頁80。

¹⁸⁵ 《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文獻編號：408008286。

¹⁸⁶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六百四十，頁152。

¹⁸⁷ 《清史稿》，卷三六五，頁11434。

¹⁸⁸ 同上注，卷三七三，頁11543。

當然也有非宗室被擢為四等侍衛的例子。如康熙四十二年，「上幸西安，〔殷〕化行迎謁，授其子純四等侍衛」。¹⁸⁹道光年間，賽沖阿曾孫清福「襲官四等侍衛」。¹⁹⁰殷化行是漢人，清福乃赫舍里氏，與「宗室」無關。亦有非宗室被貶為四等侍衛以示懲罰的例子，如嘉慶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頭等侍衛明興被降三級，貶為四等侍衛。¹⁹¹嘉慶十一年三月，豐仲濟倫被降為四等侍衛。¹⁹²孫慶長嘉慶十三年因事革職，命在四等侍衛上行走。¹⁹³上述三人皆非宗室。此外，與賞更高等級的侍衛銜類似，亦可賞「四等侍衛」銜與辦事大臣，如嘉慶十九年(1814)賞給盛京副都統緒莊「四等侍衛，仍戴四品頂戴，馳駟前往庫車辦事大臣」。¹⁹⁴道光二十一年，輯瑞也曾以四等侍衛任烏魯木齊領隊大臣。次年，以頭等侍衛授阿克蘇辦事大臣。¹⁹⁵伊昌阿在道光年間先任乾清門四等侍衛，後升為乾清門三等侍衛，再擢為御前侍衛。¹⁹⁶

「前鋒侍衛」不屬於侍衛系統

「前鋒侍衛」滿文轉寫為 gabsihiyan hiya, gabsihiyan 乃「先鋒」、「前鋒」之意，史料中譯為「噶布什賢」、「噶卜什先」、「噶把什」、「噶把喜賢」、「噶布世先」等。¹⁹⁷如《內閣史院滿文檔》載有噶布希賢侍衛白爾格圖。¹⁹⁸「前鋒侍衛」稱謂雖有「侍衛」兩字，但不屬於侍衛系統。

不知是否巧合，目前有據可查的前鋒侍衛轉入侍衛系統時，幾乎皆任頭等侍衛，¹⁹⁹如西津泰乾隆五十六年(1791)為前鋒侍衛，嘉慶元年為頭等侍衛；²⁰⁰特爾慶額道光十八年(1838)為前鋒侍衛，咸豐元年(1851)為頭等侍衛；²⁰¹特依順保嘉慶六

¹⁸⁹ 同上注，卷二八一，頁10159-60。

¹⁹⁰ 同上注，卷三四八，頁11212。

¹⁹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1797號；《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91032-001。

¹⁹²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73913-001。

¹⁹³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1804-4號。

¹⁹⁴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72863-001。

¹⁹⁵ 蒲開夫、朱一凡、李行力(主編)：《新疆百科知識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849；《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50750。

¹⁹⁶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42813。

¹⁹⁷ 商鴻逵等：《清史滿語辭典》，頁87。gabsihiyan 一詞早期關外時期有「噶布希賢」、「噶把喜賢」等音譯法，混淆了尖團音，或乃國初制度未立時草率用字。入關後則有所糾正，多譯為「噶布什賢」，此譯法為佳。

¹⁹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初內閣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上冊，頁496。

¹⁹⁹ 亦有特例，如乾隆十五年(1750)，傅玉由二等侍衛轉為前鋒侍衛。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1206-2號。

²⁰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1128號。

²⁰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1765-3號。

年(1801)為前鋒侍衛，十年(1805)轉頭等侍衛；²⁰²孝順阿先是任前鋒侍衛，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頭等侍衛上行走，嘉慶九年(1804)升乾清門頭等侍衛上行走。²⁰³至於侍衛轉前鋒侍衛時，等級需是三等侍衛，如賴塔先任三等侍衛，後升為前鋒侍衛；²⁰⁴祥麟道光元年(1821)為三等侍衛，四年(1824)升前鋒侍衛。²⁰⁵箇中原因，或是出於品級上的考慮。如康熙年間規定，前鋒侍衛員缺，可於三等侍衛內選拔。²⁰⁶因一等侍衛乃正三品，三等侍衛乃正五品，前鋒侍衛的品級與二等侍衛相同，介於一等侍衛與三等侍衛之間，乃正四品。

前鋒侍衛屬前鋒營系統，地位介於「前鋒參領」和「前鋒校」之間。²⁰⁷奕賡《侍衛瑣言》云：「前鋒侍衛、上駟院侍衛，俱由大門侍衛內保送原缺、原額。」²⁰⁸此說似不確。從史料來看，前鋒侍衛主要是從前鋒營系統內選拔，並按前鋒藍翎長、前鋒校(滿文為 *gabsihyan i juwan i da*，音譯為「噶布什賢依專依達」)、前鋒侍衛(滿文為 *gabsihyan i hiya*，音譯為「噶布什賢依蝦」)、前鋒參領(滿文為 *gabsihyan-i janggin*，音譯為「噶布什賢章京」)、前鋒統領(滿文為 *gabsihyan galai amban*，音譯為「噶布什賢噶喇依昂邦」)依次晉升。²⁰⁹如瑚圖里乾隆四十六年(1781)由前鋒藍翎長補前鋒校，五十一年(1786)升委前鋒侍衛，五十二年遷前鋒侍衛，隨福康安征臺逆匪林爽文。

儘管前鋒營系統與侍衛系統各自獨立，但在職官升轉上依然互通，如護軍參領可從一、二、三等侍衛、護衛內揀選。²¹⁰此規定頒行於康熙年間，是將既成事實加以制度化，在順治朝已然如此，如穆占順治年間任侍衛，之後則一直在前鋒營系統任職，順治十六年(1659)為前鋒參領，康熙十二年(1673)為前鋒統領。²¹¹

雍正三年，上三旗和下五旗的前鋒侍衛始分開遴選：「三旗前鋒侍衛員缺，於侍衛、副護軍參領、前鋒校內遴選。五旗前鋒侍衛員缺，於護衛、副護軍參領、前鋒校內遴選。各選擬五六人引見補授。」²¹²乾隆六年，規定「前鋒侍衛員缺，由該翼統領於本旗二、三等侍衛、護衛、副護軍參領、前鋒校內遴選」。²¹³換言之，上三旗與下五旗前鋒侍衛的遴選差別在於，上三旗前鋒侍衛從侍衛中選拔，下五旗前鋒侍衛則由護衛中拔擢，而「侍衛」與「護衛」本身便是區分上三旗與下五旗的標誌之一。

²⁰² 同上注，702002180-11號。

²⁰³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2冊，頁436。

²⁰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5651號。

²⁰⁵ 同上注，701005176號。

²⁰⁶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五十，頁447-48。

²⁰⁷ 張德澤(編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93。

²⁰⁸ 奕賡：《佳夢軒叢著》，頁74。

²⁰⁹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366.

²¹⁰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五二，頁472。

²¹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5651號。

²¹²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五十，頁448。

²¹³ 同上注，頁449。

結 論

本文說明了御前侍衛和乾清門侍衛亦可分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與藍翎侍衛。此外，「前鋒侍衛」不屬於侍衛系統，屬於前鋒營系統。儘管前鋒營系統與侍衛系統各自獨立，但在職官升轉上依然互通。此外，史料中所謂「頭等侍衛」等同於「一等侍衛」，「四等侍衛」亦可用於褒賞，並非僅用於宗室三等侍衛降黜後的等級。

「御前侍衛」是清代侍衛中等級最高者，漢人絕難擔任。然而清代方志卻有大量漢人擔任「乾清門侍衛」甚至「御前侍衛」的記載。筆者爬梳史料，認為「御前侍衛」在語境上當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御前侍衛」包含漢侍衛，狹義的「御前侍衛」特指內廷侍衛之等級最高者。順治年間雖已從武進士中選拔侍衛，然而直到雍正元年才頒布詳細方案，此前或會將「漢侍衛」泛稱為「御前侍衛」，此約定俗成稱謂在規定出臺後依然存在。至於方志中將「漢侍衛」歸類為「乾清門侍衛」，則是明顯的訛誤。

關於清代侍衛的等級，有一細節值得留意，班弟康熙四十六年(1707)曾任乾清門阿敦侍衛內行走。²¹⁴「阿敦」是滿文 *adun* 的音譯，*adun i hiya* 漢譯為「上駟院侍衛」。²¹⁵所謂「乾清門阿敦侍衛」，並非乾清門侍衛的某一等級，而是特指乾清門侍衛中被指派管理上駟院者。內務府亦設有大批阿敦侍衛，負責騎試御馬兼驗看所收新馬烙印，其中八人為「騎溜御馬侍衛」，管理騎溜御馬。²¹⁶內務府亦有養狗處、養鷹處等機構，江寧織造曹寅即曾以藍翎侍衛充任養狗處頭領。²¹⁷更有大量侍衛在養鷹處任職。²¹⁸康熙五十三年(1714)，耶穌會神父利國安(Giovanni Laureati, 1666–1727)致德澤亞男爵(Baron de Zea)的信中亦提到各地進宮一種叫「海青」的鳥，清廷命侍衛送到飼養場馴養，²¹⁹這當是交給「養鷹處侍衛」飼養。

清代侍衛官中類似「阿敦侍衛」的雜役差事尚有諸多名目，如黏竿處侍衛、²²⁰上駟院司鞍侍衛、司轡侍衛、養鷹狗處侍衛、諳達侍衛、硬弓侍衛，尚茶侍衛、尚膳

²¹⁴ 《內閣大庫檔》，登錄號：024546。

²¹⁵ 商鴻逵等：《清史滿語辭典》，頁3–4。

²¹⁶ 張莉：〈清代上駟院綜談〉，載清代宮史研究會(編)：《清代宮史探微：第一屆清代宮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頁58。

²¹⁷ 黃一農、黃書梅：〈曹寅好友張純修家世生平考〉，《故宮學術季刊》第29卷第3期(2012年春季)，頁15。

²¹⁸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九百三十，頁515。

²¹⁹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 la Chine*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tome 3, p. 230: “. . . qui les récompense généreusement et le remettent ensuite aux officiers de la fauconnerie.” 中譯見杜赫德(編)，鄭德弟、朱靜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冊，頁122。

²²⁰ 在黏竿處當差的侍衛若等級是藍翎侍衛，則稱「黏杆藍翎侍衛」，這亦可佐證清代侍衛可以隨意命名。參見《內閣大庫檔》，登錄號：146699-001。

侍衛、鷹鷂房侍衛、鶻房侍衛、搜檢侍衛、²²¹廄長侍衛、司宰長侍衛、蒙古醫師長侍衛、²²²等等。從這些名目繁雜的名稱可知，侍衛的取名率多隨意。

對於這些雜役當差的侍衛，學界仍有不少誤解，如賴惠敏指出：「因皇帝的特殊恩典，將雜役變成侍衛。像文奎原本是飯上人，旋即升為二等侍衛，他本是目不識丁的雜役，借着服侍皇帝的機會，晉升至四品官。可見清末的腐敗還不只是貪污問題，皇帝任意破壞官僚體制也令人十分錯愕。」²²³其實，「將雜役變成侍衛」乃是常態，與侍衛取代宦官的用意一脈相承，²²⁴並非「皇帝任意破壞官僚體制」。舉例而言，內務府各機構如養鷹鷂處、養狗處、茶膳房等處的「雜役」均有機會成為侍衛，且等級與晉升方式與大門侍衛無異。內務府包衣除了可挑選侍衛外，茶膳房向由侍衛「逐日豫備茶膳」。因每日親近御前，與皇帝的關係親密，非門上侍衛營員可比，故此從茶膳房遴選侍衛便是常態：「尚膳正、尚茶正一等侍衛員缺，於尚膳正、尚茶正二等侍衛內揀選。尚膳正、尚茶正二等侍衛員缺，於尚膳副、尚茶副三等侍衛內揀選。尚膳副、尚茶副三等侍衛員缺，於尚膳、尚茶三等侍衛內揀選。尚膳、尚茶三等侍衛員缺，於尚膳、尚茶藍翎侍衛內揀選。尚膳、尚茶藍翎侍衛缺，於茶膳人及庖長、庫掌內揀選。」²²⁵再如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冬的《摺紳冊便覽》有「茶膳房」條，該年正白旗人二達子等五人乃膳上三等侍衛，正黃旗人德克經額等七人乃膳上藍翎侍衛，正黃旗人福德等六人乃茶上三等侍衛。²²⁶光緒七年（1881）《內務府爵秩全覽》亦記載該年膳上侍衛十四人，茶上侍衛八人。²²⁷雍正元年正月聖諭，茶飯房總領都授予二等侍衛。茶房人內，授予三等侍衛者三員，藍翎侍衛者四員。飯房人內，授予三等侍衛者六員，藍翎侍衛七員。²²⁸雍正八年（1730）三月，又規定從二等侍衛飯房總領中揀選頭等侍衛，並規定此後茶飯房總領頭等侍衛缺出，皆從二等侍衛茶飯房總領內揀選。²²⁹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侍衛無一例外出自上三旗，且品級與

²²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2233-1 號。

²²²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六四五，頁 96。

²²³ 賴惠敏：《清代的皇權與世家》，頁 274–75。

²²⁴ 「侍衛取代宦官」的問題較為複雜，筆者將另文闡述。簡言之，定鼎中原後，鑑於明代宦官為禍，清廷開始大力完善侍衛制，以侍衛取代宦官的大部分職能，小到跑腿幫轎，大到承旨辦差，皆由侍衛執行，這確實有效杜絕內侍干政，宦官就此淡出政治舞臺。

²²⁵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七六，頁 707；《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第 3 冊，頁 1389。

²²⁶ 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冬《摺紳冊便覽》，頁五七。

²²⁷ 光緒七年辛卯（1881）夏季《內務府爵秩全覽》，頁二二下。該書現藏哈佛大學圖書館，掃描版可參見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 <http://pds.lib.harvard.edu/pds/view/44690293>。檢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30。

²²⁸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第 3 冊，頁 1387。

²²⁹ 同上注，頁 1388。

其他侍衛無異。御茶房一等侍衛尚茶正、御膳房一等侍衛尚膳正為正三品，御膳房三等侍衛為正五品，御茶房尚茶藍翎侍衛、御膳房尚膳藍翎侍衛為正六品。²³⁰筆者對內務府所涉無多，不過從目前的材料來看，任職於內務府各機構的侍衛職位雖低，所受封賞卻頗豐，這在香港蝠池書院刊行的《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中有大量記載。故此，賴惠敏所謂「一位目不識丁的雜役，借著服侍皇帝的機會，晉升至四品官」，實不足為奇。²³¹不過，此現象亦不禁令人聯想到明代顯達宦官的際遇。清代侍衛在職能上取代宦官，從效果上言，這確實有效防止內宦干政，惟就際遇而言，清代的侍衛與前朝的宦官依然相似。

²³⁰ 祁美琴：《清代內務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08–9。

²³¹ 這情況與漢武帝拉拔「侍中」相彷彿，事實上侍中初亦多有貴戚勳臣之後入質者，而武帝拔自寒微者亦有之，武帝似是藉由拉拔底層侍中來擺脫勳貴集團，形成一種側近政治。參見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290–92。

清代侍衛等級新探

(提要)

陳章

侍衛制是清代一項重要制度，研究卻相當匱乏。本文爬梳史料，糾正了學界在侍衛等級問題上的諸多錯誤，如「御前侍衛」和「乾清門侍衛」亦分等，「前鋒侍衛」不屬於侍衛系統，「頭等侍衛」等同於「一等待衛」，「四等侍衛」並非僅用於宗室三等待衛降黜後的等級。本文還從方志等諸多史料出發，認為「御前侍衛」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視語境而定；並對「大門侍衛」這一學界從未有過探討的名詞給予解釋。

關鍵詞： 御前侍衛 前鋒侍衛 四等侍衛 大門侍衛 清史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vels of *shiwei* in 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

Chen Zhang

Shiwei is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the research about this issue is quite scar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rrects many errors about the *shiwei*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for instance, *yu qian shiwei* and *Qianqingmen shiwei* are also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qianfeng shiwei*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hiwei* system, *toudeng shiwei* is equivalent to *yideng shiwei*, *sideng shiwei* is not only for dismissing *zongshi shiwei* down to the lower level. Additionally, this article checks the definition of *damen shiwei*, which has never been discussed or explained before. And also, after checking lots of chronicles and other historical archives, the author supposes there are two definitions of *yuqian shiwei*,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s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s.

Keywords: *yuqian shiwei* *qianfeng shiwei* *sideng shiwei* *damen shiwei*
Qing history